

中国中古史集刊

第二辑

张达志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 1897

中国中古史集刊

第二辑

张达志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古史集刊. 第2辑 / 张达志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039 - 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中古史—文
集 IV. ①K2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277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中古史集刊

第二辑

张达志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039 - 5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1 1/4

定价：85.00 元

《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二辑)

编 委 会

主 编：张达志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范兆飞 黄 楼 姜望来

雷 闻 仇鹿鸣 权家玉

孙英刚 王庆卫 肖 荣

小尾孝夫 张达志

本辑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助出版

本刊主旨

《中国中古史集刊》是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的学术阵地。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发起，致力于团结国内外中国中古史学界同仁，打造优异的交流平台与对话空间。论坛常设机构由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筹委会与《中国中古史集刊》编委会组成。集刊每年出版一辑，以会议论文为支撑，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并严格遵守匿名审稿制度。我们期待同道携手，兼收并蓄，砥砺争鸣，充分展示杰出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与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

目 录

Contents

论 文

何谓“中古”？

——“中古”一词及其指涉时段在中国史学中的模型	谢伟杰	3
汉晋北魏末幽州道教史事钩沉	吴羽	20
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与江右地区	[日] 小尾孝夫	40

文武分区

——南朝的空间结构与政治演变	权家玉	58
北朝社会政治进程中的行政区划变动	毋有江	93

吊诡的太极

——医家命门学说形成的机缘及其思想史意趣	肖荣	147
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	于赓哲	176
隋朝大型工程管理模式初探	贾志刚	201
新见初唐名臣裴寂墓志及相关问题	王庆卫	220
唐李寿墓寺观壁画再考察	王静	251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再研究	李辉	265

唐令复原献疑二札

- 以唐、日令式移植为中心 赵晶 293

唐前期西北的交通运输

- 以西州为中心 古怡青 309

唐代宪宗朝官僚集团的矛盾及其党派分野 黄楼 341

黄巢史事与藩镇格局

- 从王黄集团（未）占领地到黄齐政权政区的考察 胡耀飞 364

南唐二陵玄宫制度渊源与国家正统性表达 崔世平 407

“妇人启门”构图及其意义 沈睿文 422

“文”、“学”与“文学”：6—8世纪中国士人的文化分野

- 兼反省包弼德的唐宋思想转型模式 孙英刚 432

书 评

黎明钊 《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 林昌丈 449

金发根 《中古中国地域观念之转变》 吕思静 457

凌文超 《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 邓玮光 464

林晓光 《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

- 研究》 王彬 477

编后记 489

论
文

何谓“中古”？*

——“中古”一词及其指涉时段在中国史学中的 模塑

谢伟杰（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学系）

近代中国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之下，多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学科出现的同时，新概念也伴随而至；而旧有的学问为了回应挑战，也利用从西方输入的学术工具，重新自我包装，以求在学术界的新局面中保有一席之地。^[1]新的、西方的学术概念与词汇被大量引介至中国，或从欧美直接翻译引进，如严复（1854—1921）翻译诸多西方著作^[2]；又或透过日本作为中介，利用日本的汉

* 本文为香港理工大学所提供研究基金（编号 1-ZE3S）之部分研究成果。在撰写过程中，曾分别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与于杭州西湖国学馆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做扼要报告，获得诸位学界师友的宝贵意见。初稿蒙同事翟志成教授慷慨审阅一过，研究助理张璠璟小姐细心校阅，襄助甚多。在此一并致谢。

[1] 有关现代中国人文学科如何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发展、传承和创新，可参考最近出版的三部论文集中的相关讨论：Brai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s.,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hn Makeham ed., *Learning to Emulate the 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rif Dirlik, Guanan Li, and Hsiao-pei Yen eds.,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王汎森：《时间感、历史观、思想与社会：进化思想在近代中国》，见陈永发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370—371 页。

字组合表达新式学术语言和概念^[1]。许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词汇，例如“经济”、“历史”、“宗教”^[2]等均从日本转手而来。

本文的焦点在于中国史学上“中古”一词的运用。当今学界中，“中古”一词被普遍运用于指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相当于3至9世纪。然而，这样的用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中国传统史籍中本有“中古”一词，其意义与学界现时习用的“中古”又有何异同？现代中国史学中运用的“中古”概念，又是否受到外国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学界的系统讨论似不多见。^[3]本文不揣浅陋，以此为题，进行概括的考察。

[1] 最早对此一现象做出系统论述的，是身预此潮流之中的王国维于1905年所著《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傅杰、邬国义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30页。近年有关日本词汇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以及东亚社会、文化所起之作用的研究，参见冯天瑜：《新源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0—524页；陈玮芬：《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83—189页。

[2] 刘禾称这类以中国古典字词经由日本汉字运用而重新组合，并回流中国的词汇为“return graphic loans”，见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02-342。对于“宗教”一词，陈熙远曾做了一番梳理的功夫，参见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2002年第4期，第37—64页。

[3] 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中的“现代性”(modernity)的讨论已如汗牛充栋，但对于“中古性”(medievality)的讨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均明显不足。近年中国学者中注意到此问题的，参见孙英刚：《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第147—157页，当中介绍了欧洲史学中的“中世纪”(medieval/middle ages)在西方史学中出现的过程，以及如何传至东亚，影响日本和中国史学界。西方学者的相关讨论，参见Timothy Brook, “Medievality and the Chinese Sense of Histor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1 (1998) :pp.146-164。此外，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第417—437页，对于了解日本词义在中国近代史学对时间概念的划分，甚有参考价值；陈硕文：《“现代”：翻译与想象》，《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年第2期，第339—352页，也对近代中国在“近代”与“现代”作为时间观念有所探讨。

一、传统典籍中“中古”一词的运用

“中古”在时间意义上，顾名思义，是指“中间的古代”。既是处于中间，必然有上、下，或前、后，方能有所区隔，把它作为“中间”（in-between）的位置显现出来。因此，相对于“中古”，在其前应有更早的古代，在其后也有比较接近论者时代的古代。简言之，在两个古代中间的时段，就是“中古”。至于如何界定这三段古代，在于评论者从什么时段和立场来考虑。

中国传统典籍中以“中古”作为时间概念的例子不少。以下略举不同时代之例，以见古人对“中古”的认识和运用。

先秦典籍例如《周易》，就运用了“中古”一词。例如《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当中认为《周易》之作，起于中古之时。那么，这“中古”是什么时候？同篇又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2]

因此，《系辞》中之“中古”就是殷商后期与西周之初。一般相信，《系辞》为战国时代形成的文献。从《系辞》所言，可见当时有“中古”为商末周初之说。

战国时代文献《孟子》中也有“中古”一词。孟子在与别人谈论棺椁制度时说道：“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3]

处身于战国初年的孟子所说的“中古”又是指什么时候？孟子并未明确说明，但后代学者对此有所推论。东汉赵岐注《孟子》，认为“中古谓周公制礼以来”，说的就是西周建立后。清代的孔广森在

[1] 周振甫：《周易译注》，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7页。

[2] 同上书，第272页。

[3]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经学卮言》中则认为：“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礼，则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1]推究孟子言制度之意，则孔氏之解释较合理。如是，孟子所言之“中古”指西周初年以前。

若就《易·系辞》与《孟子》二例言之，则战国时人所说“中古”泛指商代后期至西周初年的一段。

至秦王政扫平六国，肇建秦朝之时，曾与一众廷臣议帝号。廷尉李斯等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2]，因而劝秦王取“泰皇”为号。秦王否决，并自以“皇帝”为号，云：“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3]遂下令废谥法。始皇说太古无谥法，而中古始有谥法。以谥法之有无为断，其所言之太古大体为西周以前，而中古则为西周建立之后。

至于东汉时编纂的《汉书》，在《艺文志》中讨论《周易》的成书历程时，有“世历三古”一语。此“三古”何所指？三国时人孟康注解谓：“《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4]

根据孟康，似东汉至三国之时，对古代划分为上、中、下三段时间，而当中的中古即为周文王时代，也就是殷末周初之时，并以孔子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晚期为中古下限；自孔子开始，已进入下古时代。

其实孟康的解释有其来源。所谓上、中、下“三古”之说，东汉末年大儒马融和郑玄均有发挥。马融注《尚书》，解释“三世”

[1]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99页。

[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页。

[3] 同上书，第236页。

[4] 《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03页。

云：“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1]郑玄的解释则推向更古的时代，谓：“结绳同时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2]

马融以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作为上古，西周初年为中古之始，至于春秋后期、孔子在生之时为下古之开端。郑玄把时段推得更早，以原始蒙昧之时为上古，传说中的神农之时为中古，同为传说时代的五帝之时则为下古。当然，马、郑二氏对上、中、下三古的解释是基于他们对《尚书》和其他古典编纂之时的历史时间观念的解释。

其后，在西晋惠帝朝廷中任职三公尚书的刘颂上疏论法制云：“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及殷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今时论敦朴，不及中古。”^[3]在其后的往复讨论中，门下的官员也说：“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4]

西晋官员指出，在理想的上古之世，所谓先王“议事以制”，不用刑辟。至于“昔先王议事以制”更是引述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铸刑书，叔向与子产争论时所说的话。^[5]上古与中古在法制上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上古之时议事以制，而中古以来则执法断事，这说的是春秋以后的时期。更具体就是战国时期多国推行法制改革的结果。这一中古指的是战国以来，秦汉之时。

西晋时人以秦汉为中古，尚有一佐证。左思作成《三都赋》后，遍请名家为其赋作序揄扬。刘逵为之作序有言：“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

[1] 《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尚书正义》卷1，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70年版，第3页。

[2] 《尚书正义》卷1，第115页。

[3] 《晋书》卷30《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37页。

[4] 同上书，第938页。

[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六年》，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74页。

京》文过其意。”^[1]刘《序》中指的中古为赋者是西汉大文豪司马相如、东汉名家班固和张衡。显然，此一中古指的就是两汉时期。南朝刘宋时，著名文士鲍照作《河清颂》中有言：“察之上代，则奚斯、吉甫之徒，鸣玉銮于前；视之中古，则相如、王褒之属，施金羁于后。”^[2] 鲍照以上代和中古对言，上代所举者为周代公子奚斯和尹吉甫，中古所举则为汉代司马相如与王褒。可见，此中古亦即两汉。北朝方面，就史传所见，北魏太武帝时的术艺之士殷绍在一篇上表中云：“又史迁、郝振，中古大儒。”^[3] 当中所言史迁为司马迁，郝振虽不知为何许人，但要之所言涉及汉代当无疑问。北魏后期，大臣崔光为了劝谏灵太后，“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其后，崔光又向灵太后进谏，举《春秋》所纪陈、宋、齐、卫女为例，又举西汉昭帝上官皇后为例。^[4] 以此推断，其“中古”包括了春秋时代至于汉代。崔光此一中古时段似乎甚为宽泛。此外，也有以中古指涉更早时期的例子。另一北魏官员崔楷在上疏论水患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总结云：“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5] 井田之制为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之制，而被认为施行于周代盛时，则“中古井田之利”所言当泛指周代。

及至唐代，“中古”仍然有着宽泛的指涉。初唐著名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不止一次运用“中古”一词，例如在注《地理志》时，说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6]，此一中古，说的是汉代或其以后的时代。

[1] 《晋书》卷 92《文苑传》，第 2375 页。

[2] 《宋书》卷 51《鲍照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79 页。

[3] 《魏书》卷 91《术艺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55 页。

[4] 《北史》卷 44《崔光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15 页。

[5] 《魏书》卷 56《崔辩传》，第 1254 页。

[6] 《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第 1543 页。

唐中宗时，武三思用事，魏元忠为朝中重臣，然无所匡正，陈郡男子袁楚客以书规谏，当中有云：“阉竖者，给宫掖扫除事，古以奴隶畜之。中古以来，大道乖丧，疏贤哲，亲近习，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权。故竖刁乱齐，伊戾败宋。君侧之人，众所畏惧，所谓鹰头之蝇、庙垣之鼠者也。后汉时用事尤甚，晚节卒乱天下。”^[1]

袁楚客批评中古以来，阉宦受到重用，因而乱政，而其首先举出的例子，即为齐桓公重用竖刁而致祸，后汉末年卒因宦祸而失天下。由此而言，袁氏所言之中古始于春秋而至于后汉时代。盛唐文士李华评论其友萧颖士时，谓“颖士当以中古易今世”，并进一步指“颖士尤罪子长不编年而为列传”。^[2]就中萧颖士对司马子长（司马迁）深有看法，而李华指涉与萧颖士有关的中古，就是指汉代。中唐以后的名臣陆贽在谏表中称述商周二代的圣君贤相，然后与之对比，指“中古以降，其臣尚谀，其君亦自圣”。^[3]陆氏所言之中古则是周代以后，指秦汉以降。

至于唐代的释部著作中，也可见运用“中古”作为一个历史时间概念之例。《续高僧传》记载来自新罗国的僧人时提及“中古之时，辰韩、马韩、卞韩，率其部属，各有魁长”^[4]，当中所述朝鲜半岛上的三韩，其存在时间大约为公元100—300年，相当于中国东汉至西晋之时，则此一中古所指为何时，非常明了。另一释部著作，释道宣所编之《广弘明集》中，收录了唐初沙门释明槩反驳傅奕反佛之论，谓：“槩闻三皇统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远大，德普覆而平

[1] 《新唐书》卷122《魏元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39页。

[2] 《新唐书》卷194《卓行传》，第5563页。

[3] 《新唐书》卷157《陆贽传》，第4917页。

[4]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5《唐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